

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

正当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后急于寻求出路的时候，他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，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。与此同时，又从报纸上看到了吴佩孚办的洛阳军官学校招生的新闻。杜聿明决心当个军人的志向是肯定的，现实也在召唤。

米脂县杜家湾

杜聿明字光亭，陕西省米脂县人，1904年11月28日出生，世代居住米脂县东区吕家峁杜家湾，距县城50余里。

杜聿明的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。父亲杜良奎，字斗垣，是清末举人。祖父生有三子，长子良辅，良奎居二，三子早年病故。于是良奎秉父命婚娶两妻，按当时封建习俗，一子顶两房，以为三弟子承祧。

杜聿明的生身母亲叫高兰庭，出身贫寒家庭。聿明有4个姐姐、1个妹妹，还有1个弟弟名聿德。伯父良辅也生有4个女儿、3个儿子。加上祖父母及所雇长工6人，是一个20余口人的大家庭。

杜家除宅院外，拥有土地100余垧（一垧为四亩），三分之

二的土地出租，其余雇长工耕种。伯父良辅当家，颇善经营，比如日常所需衣食品，都是他在每逢五天一次的集市上亲自购置的，很少发生缺东短西的情况。

杜聿明的祖父雅好诗文 家中专门辟了一个房间用来藏书。杜良奎从小受到乃父的熏陶，也很勤奋向学，省试居然得中举人。良奎还很喜爱武术，拳棒刀剑，样样都练，每在大庭广众热闹场所中献艺一番 博得几声喝彩。他还学习医药偏方 欣赏气功治病 常为人义务诊治 不择贫富。因此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游甚广 加上他急公好义 爱打抱不平 所以 在乡里中颇有一点豪侠的名气。

良奎一生不屑于仕进 中举后清政府派为即补县知事 他没有应命履新，而是到西安长安大学堂教书去了。当时，全国各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，继而又出现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秘密会社组织 风声所播 遐迩瞩目。西安这座 统西北交通冲要的古都 外埠一切新思潮 很快就流传而至 杜良奎不能不受影响 后来参加了同盟会。在辛亥革命时期 杜良奎响应孙中山先生“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革命号召 数度回米脂 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，后来又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，有过几桩革命义举。但他也曾率领米脂民团，镇压过白朗农民起义。

这时，杜聿明还年幼不懂事，辛亥革命在他童年的头脑里，只是印下了一些刀光剑影。他开始喜爱玩弄枪枝，曾经偷偷把枪拿到野外去打山鸡，偶有猎获就感到从未有过的乐趣。然而，杜良奎并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“一介武夫”。因此，他在榆林镇边学校教书时，就把杜聿明带在身边同住了几年，12岁时送回米脂，在李鼎铭^①办的成家岔小学读书。李是杜聿明二

李鼎铭，陕北的开明士绅，曾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。毛泽东同志所写《为人民服务》一文中提到过他。

姑的儿子，是杜的表哥，比杜年长二十多岁。杜住在二姑家里，不仅在生活上受到照顾，学习上也得到了表哥这位严师的指点。

不久，杜的家庭发生变故，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。原来，杜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后，当家的伯父不久也病故了，家务无人管理，全家生活顿时陷于混乱。杜的舅父虽曾代为管家，但因经营不善，家业亏损，不久就卖了一部分土地，杜家只好把他辞退了。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，素来不问家务，惟有让自己的儿子放下书本，回来承担管家的重担了。杜聿明虽是少年当家，表现得却比他舅舅高明。例如，他学伯父在世时管家的办法，每逢赶集，就把家中所需的物品开列清单，照单采购，很少发生差错。他学到的算术知识也派上了用场，所结账目，准确无误。他还经常和雇工一道干活，勤劳持家，居然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、保全家业的本领。可是，杜聿明的学业，特别是国文和英语则基本上荒废了。杜 16 岁时，其父良奎由榆林回家，对杜进行了一次学业测试，除算术尚能及格外，其他科目几乎都交了白卷。杜良奎大为失望，便将家务交给侄儿杜聿成管理，把杜聿明带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去了。那是 1920 年夏天的事情。

在榆林中学

当时，杜聿明的父亲任榆林中学的国文教员。这所中学的校长叫杜斌丞^①，是杜良奎的侄子。斌丞具有炽烈的民主爱国思

杜斌丞，陕西米脂人，生于 1888 年。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，陕北民主革命的先驱者，前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。1947 年 3 月胡宗南部采取栽赃诬陷手段，逮捕了杜斌丞，同年 10 月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。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“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”。周恩来同志评价他是“鲁迅式的共产党员”。

想，常常登台向学生宣传“教育救国论”，对杜聿明多少有些影响。但是，杜在中学期间，却重武轻文，尤其爱好体育，加上校长杜斌丞请来一位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和武术的体育教师，杜很佩服这位教师，很想从他的身上学一些本领，因而在每周两堂体育课中学习特别专心，并且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等要领，使他对军事知识和技术更加发生兴趣。

杜聿明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，正好是五四运动之后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，青年学生要求抵御外侮，救亡图存的民主爱国运动风靡全国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潮也开始传播，榆林中学图书馆里也引进了一些进步刊物，如《新青年》等。在时代推动和环境影响下，杜聿明立下了这样的志向：要么学好英语，能够出洋去看一看世界强国，学一学它们的富国强兵的方法；要么投笔从戎，能够自己训练出一支保家卫国的精兵。杜对英语确曾下过一番功夫，可是由于发音不准，会话困难，毕业考试时成绩不佳，以致对出洋丧失了信心，但却增强了投笔从戎、做一个爱国军人的决心。

1923年，刚满19岁的杜聿明，在榆林中学毕业。同年8月，杜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。曹也是米脂县人，父亲是米脂工商界的头面人物。她原先在家中学习诗文绘画，婚后才到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去读书。

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，外则列强欺凌，丧权辱国；内则军阀割据，战乱频仍，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，促成革命势力的联合，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。作为合作的产物之一，是在广州黄埔岛办起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（以下简称黄埔军校）。正当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后急于觅求出路的时候，他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，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。与此同时，又从报纸上看到了吴佩孚办的洛阳军官学校招生的新闻。杜聿明决

心当个军人的志向是肯定的，现实也在召唤。但究竟是当革命新军人还是步旧军阀的后尘，他可以有两种选择。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，杜聿明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心走革命军人这条道路，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。他宁肯舍弃近在咫尺的洛阳，而奔赴万里迢迢的广州。

投考黄埔军校

杜聿明要远离家乡、万里从军的主意，受到了家庭的坚决反对。杜良奎是同盟会会员，虽然同意儿子趋附孙中山，但他也存在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的旧意识，根本反对儿子弃文习武，投笔从戎。何况杜聿明是他42岁上晚生的长子，素所钟爱，因此坚不放行。杜聿明大闹了几次，父子顶牛达两个月之久，双方仍相持不下，眼看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北方招生的限期已不多了，杜聿明转念一想，不如先摆脱家庭的羁绊再说，便请求到北京升学。杜良奎勉强同意他赴北京投考大学。

杜到北京后，同时报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。在准备功课期间，通过伯父良辅之子杜聿鑫的介绍，认识了一批在京的陕西籍青年，他们是阎揆要、关麟征、张耀明、马志超、马励武、马思恭、杨耀、雷云孚等人。这时，北洋军阀僭窃国柄，政局混乱，不得人心，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。孙中山先生揭橥三民主义，在广州成立临时大元帅府，改组国民党，力求刷新政治，重振中华，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，爱国青年纷纷前往投效。有一天，阎揆要偶然在《新青年》上，看见载着黄埔军校仍在招生的消息，当即告知马思恭，马又奔走转告各同乡青年。杜聿明正为考大学而昼夜刻苦备课，尤其对他平素就不喜欢攻读的国文，啃起来更伤脑筋，本来考大学的劲头就不足，一听到黄埔仍在招生

的消息，精神为之一爽，首先响应同乡青年去广东考黄埔军校的倡议。杜投军意志非常坚决，这一回又有同乡结伴而行，可以放心南下。何况还有个姑表兄高明洲，在粤军总司令部所属修舰所当所长，有亲戚在广州，好歹总有个依靠。于是，杜聿明打消了投考大学的念头，毅然成行，奔向革命的黄埔军校。

第二章 入黄埔军校

开学不久，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，杜聿明同时接到了两份登记表。给他送来共产党员登记表的同学，还同时送给他一本《马克思资本论浅说》，杜聿明草草过目，既看不懂，又无兴趣。他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从根本上就厌恶“共产”二字，感到接受三民主义较之接受共产主义要自然得多，亲切得多。

投向革命的艰难旅程

1924年3月初，杜聿明与堂兄杜聿鑫以及陕籍青年同乡 11 人，冒着北国春寒，取道天津，搭乘英国轮船南下。他们原本都是学生，身上没有几个钱，只得买了最便宜的通舱票。船上只管供饭不管供菜，11 个人只买了两罐咸菜，竟从天津吃到广州。船经烟台、上海到达香港，大家登岸游逛。南国三月的阳光，已经有些灼人，而杜聿明一行仍是身着皮袄，头戴皮帽，脚登大头皮鞋，惹得街上行人大笑，一些大商店甚至不准他们进去。香港吃的东西很贵，一碗面条要 8 个便士，菜更吃不起。好在晋陕人喜欢吃醋，他们为了省钱，进饭馆就尽以醋当菜。谁知香港饭馆里加醋是要另外加钱的，结果店员过来算账，醋钱算得不少，只

好忍气吞声照付，反被店员讥之为“不知哪里来的一群乡下佬”。

4月3日，杜聿明一行抵达广州，下榻陕山会馆。随即上街打听黄埔招生的消息，得知招生虽然没有过期，但报名者已逾千人。为了保证录取，杜等11人以陕籍同乡的身份，联名给国民党元老、原在陕西任过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写了一封信，请求为之疏通。他们下榻的陕山会馆，是只管住宿，不管伙食的，为节省起见，11个人只好自己做饭吃。他们新到广州，人生地不熟，加上语言不通，生活上遇到了诸多不便，闷在会馆里真有点度日如年。

在会馆住了半个月，才接到于右任先生的回信，约杜等在某饭店见面。于右任见到这些家乡青年，不辞路途遥远，来到广州参加革命，非常高兴，问寒问暖，语多勉励，表现得十分亲切。他表示对杜等投考黄埔军校愿助一臂之力，当即写信给军校校长蒋介石，大意谓：从陕西来了11个娃，都是有志革命来投考军校的。望破格录取，将来便于开展北方革命工作。4月下旬，黄埔军校举行最后一次补考。考场设在广东大学，试题只有国文和数学两门。杜聿明喜欢数学，有点基础，比较胸有成竹。一看试卷，只是几道四则混合运算题，并不艰深，他估计可以得满分。担心的倒是国文，不知道会出个什么题目？结果是一道既复杂又简单的试题：“你为什么要信仰三民主义？”杜聿明当时对三民主义还没有什么认识，只是在《新青年》等刊物上浮光掠影地读了一鳞半爪，便把能够记忆的连缀起来，拼凑几百字交了卷。

4月底揭榜，杜聿明等11人全部榜上有名。这当然与于右任的那封信不无关系。于右任事后曾对他们说：“当时国民党准备北伐，为了便于在北方打开局面，录取学生时，对北方学生的标准就放得宽些。”

加入国民党

杜聿明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。当时军校的领导人为：校长蒋中正，党代表廖仲恺，政治部主任原为戴季陶，继为邵元冲，后为周恩来，教授部主任王柏龄，训练部主任李济深，总教官何应钦，总队长邓演达。第一期学生有 4 个队，每队下设 3 个区队，区队下设 3 个分队，共有学生 500 余人。杜聿明被编在第三队第三区队第九分队，队长为金佛庄，分队长杜从戎，分队同学有叶佩耀、李仙洲、侯镜如、黄杰、关麟征、杜聿鑫、田毅安、陈赓、马思恭等。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，其中李仙洲、田毅安在 30 岁以上，而杜聿明和陈赓、马思恭则只有 20 岁。

1924 年 6 月 16 日，黄埔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，孙中山先生亲莅训话。杜聿明和全体同学，整队在校内操场上，恭聆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。中山先生指出了革命的目标和前途，激励同志们英勇奋斗。他的宏言 谠语，使全体师生无不动容而慷慨奋发！

当时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气氛下，黄埔军校内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和具有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同学之间，尚能融洽相处。开学不久，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，杜聿明同时接到了两份登记表。给他送来共产党员登记表的同学，还同时送给他一本《马克思资本论浅说》，杜聿明草草过目，既看不懂，又无兴趣。他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从根本上就厌恶“共产”二字，感到接受三民主义较之接受共产主义要自然得多，亲切得多。因此，他终于接过国民党党员登记表，逐项填写并签了名，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。

在黄埔军校受训期间，杜聿明比较佩服的有两个人物。

一是总教官何应钦。何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能够背诵“典范令”全部条款，对各项军事训练要领能融会贯通，运用自如。他经常到课堂、操场视察，有时则身体力行，给学生做示范动作。何对射击教育非常重视，他的射击技术也很准确娴熟，表演起来，丝丝入扣。杜看得眼花缭乱，佩服不已，便认真仿效摹练，多相神似。曾以优良成绩，得到队长金佛庄与教官郭俊、部子举的表扬，也获得了何应钦的青睐。何曾在操场上问杜：“你的基本功从何而来？”杜回答说：“我在陕西读中学时，体育老师教了我一些。”何点头赞许。

二是总队长邓演达。邓是保定军校毕业生，平日不苟言笑，态度严肃。他对学生的学科、术科、生活各方面都关心，要求也很严格。每天起床号一响，邓就进入学生寝室，看见谁的动作慢，便厉声催促。同学们都怕他，一听到楼梯上大马靴的声音，就连忙提醒别人：“总队长来了！”邓很注意军营的内务整齐清洁，经常到学生寝室检查。杜聿明的床单军毯衣物，一贯叠得整齐，曾受到队上的表扬。有一次，邓检查时发现杜的内务凌乱，当众进行了批评。杜觉得委屈，申辩说：“学生的内务已经整理好了。”邓便要杜一起去寝室查看，才搞清楚是被邻床的同学换了蚊帐，上有杜的名字。杜聿明虽然受了一点委屈，内心却很佩服邓的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。

黄埔第一期学生在紧张的军事训练之余，同学间逐渐形成了左、右两派，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左派同学组织了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，以国民党右派学生为核心组织了“孙文主义学会”。杜聿明虽然在思想上与右派同学有着强烈的共鸣，但在组织上毫不介入任何一派的活动。杜和左派同学陈赓、右派同学黄杰，都有很深的交谊，从来没有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关系的不同而产生隔阂。

救平商团之乱

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国内外反动势力根深蒂固。他们互相勾结，无休止地向革命、向人民进攻。以孙中山先生为旗帜的民主力量的增长，引起他们的嫉恨和惶恐，企图予以扑灭。当时英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，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竟然在广州招兵买马，成立武装商团，妄图与反动军阀相策应，以英国炮舰为后盾，发动武装叛乱，把新生的革命力量扼杀于摇篮之中。他们不断向国民政府、革命工人、学生进行挑衅，制造了武装袭击群众游行队伍的“双十事件”。革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当即出动工团军、农团军和黄埔学生军，救平商团武装叛乱。时令正值初秋，黄埔第一期学生全副武装，迅速集结，由黄埔进入广州孙中山先生大本营附近，然后分路向商团进攻。经数小时的战斗，就全部解除了商团反动武装，陈廉伯只身逃往香港，广州重新恢复了革命秩序。

商团有英帝国主义作后台，以香港为后方，配备了较好的武器。而黄埔学生军和工团军、农团军配备的武器，大都是苏联援助的。有不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陈旧武器，另外还有德造马克沁重机枪、日造三八式步枪、国造汉阳七九步枪等。然而，革命武装终于用这些羸劣的武器迅速消灭了商团，充分显示了革命精神的威力。杜聿明手握三八式步枪，第一次经历了这场战斗。

参加第一次东征战役

黄埔第一期学生在校受训 6 个月，1924 年 12 月毕业。当时，

陈炯明反革命军队虽然被迫退出广州，却仍然盘踞东江惠州地区，妄图卷土重来。第一期学生毕业，革命政府即着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，以捍卫革命政权。首先以黄埔师生为基干，成立了两个教导团，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，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。杜聿明被分配到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，他过去管理家务的经验，竟在军队里派上了用场。士兵伙食费一月 6 元，每天菜金才 1 角多钱，他精心安排，带着炊事兵上街买菜，然后又跟着下厨做饭，全连伙食办得很好，深受连长和士兵的称赞，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。

教导第一团驻在黄埔岛训练。杜当副排长后，对士兵管理严而偏苛，士兵稍有疏忽，他动不动就处罚跑步或斥骂，以致不得兵心，处境尴尬。

1925 年春，孙中山大元帅下令东征，攻打陈炯明，教导第一团参加了这次东征。担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同学，见杜在连里处不下去，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。宣传队的任务，一是宣传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；二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；三是维护检查军风纪，搞好军民关系。宣传队往往比部队先出发，沿途召集群众，开展宣传工作。杜不会说广东话，无法直接向群众宣讲，陈赓是湖南人，却通晓粤语，常常站在杜的身边给他当翻译。杜曾经问陈赓：“你的广东话说得很好，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向群众讲呢？”陈笑了笑说：“你的枪法很好，口齿却较迟钝，需要有机会多多练习，这对你有好处。”

东征途中，杜聿明执行检查军风纪的任务比较认真。他发现任何一个官长或士兵，虽只打破老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，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，不稍假借，有时自己掏钱赔偿。他同时也看到，陈炯明部队如同土匪，肆意损害人民利益，老百姓恨之入骨。而革命军则处处受到人民欢迎，群众主动摆茶送水，

踊跃充当向导或送给情报。两相对比，使杜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

教导团仓卒建立成军，没有实战经验，初次出征就闹了一个笑话。有一天，第一团在向敌行军中，忽然听见先头尖兵连响了几枪，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，响个不停。团长何应钦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准备战斗，自己赴前方了解情况。经过观察，发现对方不像敌人，命令停止射击，派人去联系。原来是左翼第二团行进错了方向，团长王柏龄率部绕了一个山头，走到第一团对面来了，把第一团当成敌人，开枪射击，闹成一场误会。幸亏何应钦很快制止，没有造成重大伤亡。

三天以后，教导团学生军前进到淡水城下，与陈炯明叛军展开正面攻防战。以校长身份指挥学生军的蒋介石，决定对凭城固守之敌进行强攻，在官兵中征选“敢死队”作为爬城先锋，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沈应时担任敢死队长，队员有百余人。陈赓、杜聿明虽然也自告奋勇报了名，但因宣传队员不在应征之列，仍随团参加战斗。淡水是个小县，城墙不高，敢死队在火力掩护下，搭木梯迅速攀上城墙，驱散守兵，打开南门，陈赓、杜聿明即随部队冲入城内。战列部队继续肃清残敌，占领阵地，宣传队则展开宣传安民工作，顿时淡水城内，军民一片欢腾。但是担任左翼攻击的第二团出了问题，该团在淡水以北与叛军接触后，迅速败北，向淡水撤退。淡水北门外有一座小山，由第一团据守，陈部乘势进攻小山。蒋介石、何应钦等人都到小山上，指挥第一团顶住陈部攻势，同时严令第二团进行反攻。在两个团夹击之下，陈炯明部被打垮，于是结束了第一次东征战役。

第一次东征淡水之战，为期甚短，但在这短短的几天里，对杜聿明的思想却有着重大的影响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对古书上所载一切嘉言懿行，虽然领会不深，但有一句话是很有感触

的，即：‘择其善者而从之’。我认为教导第一团学生军，是真正为民众的革命军队，既然蒋介石、何应钦是宣扬三民主义的将领，我也就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了。”

第三章 大革命初期奉派到北方

杜聿明回陕北的目的，当然不是要居家过小康的田园生活，他是自有打算的。杜认为，当时国内形势，军阀土豪，各树一帜，据地称雄，独当一面，野心家都不惜冒险以赴。处此乱世，自己也很想能够际逢时会，建成一支力量，开辟一方局面，干一番事业。

谒见孙中山先生

2月的广东，气候渐热。杜聿明随第一次东征军进驻淡水后，长了一身疥疮，痒痛难熬，搔后溃烂流血，部队给假让他回广州医治，同行的还有堂兄杜聿昌、杜聿鑫及杨启春 3人。就医一个星期，疥疮幸愈，杜与 3人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先生。廖先生一见到 4个北方籍学生，不禁大喜说“你们来得正好，胡景翼要办军官学校，连连打电报请广州派人协助。现在派你们就到河南去，帮助胡筹备建校。你们是北方人，熟悉北方各方面情况，必能胜利完成这个任务。”于是，军校给他们每人发了 100元毫洋作为路费，嘱咐从速北上。由于当时南北陆路交通不畅，行程路线不如海上便捷，决定由广州乘船到天津，再去北京，转车南下开封。临行前，廖先生将一封信交给杜聿明，要杜

等经过北京时，将信面呈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执政府谈判国事的孙中山先生，并代表黄埔全体师生，向因劳瘁成疾、正卧床就医的中山先生恭致慰问。杜把这封信揣在内衣口袋内，并将袋口用线缝好才上路。

3月初，杜一行4人到了北京，随即到中山先生住地，请求谒见。这时，中山先生病势已经沉重，经常处于昏迷状态，不能言语。汪精卫出来接待，要他们稍候片刻，等孙总理醒后再见。不一会，杜等随汪轻步进入总理卧室，总理睁开了眼睛，杜等立即向他敬礼，然后由杜将廖仲恺先生亲笔信双手递给站在病榻旁的副官马湘。总理转瞬间又昏迷过去。杜等在病榻前站立片刻，即由汪精卫领进客厅。他们向汪询问了总理病情以后，就回到旅馆，由杜聿明执笔，写了一封致廖仲恺先生的信，汇报了总理的病情。当杜聿明一行到达开封的第三天，即1925年3月12日，就听到了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。杜等哀悼逾恒，表示决心，一定要遵照总理遗训，革命到底！

在北方的坎坷遭遇

廖仲恺先生给予杜聿明等人的任务是，应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请求，协助胡仿照黄埔军校开办一所同样的军校。胡早年加入于右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，1921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，胡任第一师师长。第一次直奉战起，开赴河南援直。奉系失败后，胡率部进驻直隶顺德，归直系曹锟、吴佩孚指挥。后因受吴佩孚的歧视压迫，于1924年冬与孙岳一起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，推翻了曹锟政府，驱逐溥仪出宫，由皖系段祺瑞组成临时执政府，同时成立了国民军。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；胡景翼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、河南军务督办；

孙岳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。胡景翼是陕西人，他对陕籍黄埔一期学生杜聿明等的到来，格外满意。杜等在胡的直接领导下，协同苏联顾问，顺利地筹办开封军校。可是进行只1个月之久，胡景翼即病逝，由该军第二师师长岳维峻继任军长和河南军务督办。岳维峻的政治倾向、思想作风，与胡景翼大相径庭，对苏联顾问和黄埔学生都不相容。不久苏联顾问愤然离去，开封军校随之也就停办了。杜聿明等在河南没有容身之地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快快回到陕北。

杜聿明回陕北的目的，当然不是要居家过小康的田园生活，他是自有打算的。杜认为，当时国内形势，军阀土豪，各树一帜，据地称雄，独当一面，野心家都不惜冒险以赴。处此乱世，自己也很想能够际逢时会，建成一支力量，开辟一方局面，干一番事业。所以，他虽然憎恶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横征暴敛、鱼肉乡里的行径，但为进身之阶，不得不勉为迁就，去和井联络。井表示愿意容纳，但并没有加以任用。

机会很快到来。米脂县西川有一个叫吴宝山的大地主，不甘寂寞，大发官瘾，愿意出钱输粮，招兵买马，成立一支军队。吴花了几百两银子，在国民二军高桂滋团长那里，买到了一个补充营营长的官衔。高桂滋也是陕西人，曾任陕北镇守署连长，后投胡景翼靖国军任营长，随胡出陕升任国民二军团长。高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，乐得委任吴宝山为该团补充营营长。吴打着这个旗号大肆活动，除纠集家属亲友任该营军官外，并广为搜罗当地生活困难的农民及一些井岳秀部的逃兵。但吴宝山本人和所任军官，多数对军事知识技能或者一知半解，或者是门外汉。他听说杜良奎的长子杜聿明是从黄埔军官学校回来的，即以重金聘请，任杜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。

杜聿明当上补充营副营长以后不久，高桂滋就命令该营到